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的互联网扶贫^{*}

陈联俊 程京武

【内容提要】互联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事业有巨大价值，表现在为贫困地区带来发展的可能性，活跃了贫困群众的精神思维，延伸了社会交往关系，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互联网扶贫事业的影响因素有技术发展、资本投入、文化传播等方面。实现互联网扶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治理普及网络技术应用、协调网络技术机制、满足网络技术权益、强化网络技术保障；通过制度治理明确网络扶贫多赢理念、改善政府网络扶贫效能、发挥企业网络扶贫价值、激发个体网络扶贫动力；通过文化治理突出网络文化引领、发掘网络文化需求、规制网络文化冲突、优化网络文化生态，充分体现互联网扶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 互联网扶贫

作者简介：陈联俊（1974-），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2）；程京武（1963-），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2）。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① 脱贫攻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人群为主^③。互联网技术在扶贫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需要深入挖掘其价值，开展有效的网络扶贫治理，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互联网扶贫的价值意义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扶贫领域可以发挥扩大经济效应、活跃精神思维、丰富社会交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不同方面作用，从而推动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1. 扩大经济效应

“传统扶贫和脱贫方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扶贫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④ 互联网时代是财富扩张的时代，世界经济资源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聚集，从而产生放大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空间政治生态净化研究”（19BDJ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页。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③ 参见《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hlwtjbg/202004/P020200428399188064169.pdf>。

④ 梁俊山、方严英：《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的现状、困境及出路——以龙驹镇农村淘宝为例》，《电子政务》2019年第1期。

果,刺激经济扩张和消费升级。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事业来说,贫困地区可以从互联网经济中发现市场需求,促进产品和服务输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拉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网络经济为贫困群众带来经济生产发展机遇,在广泛的信息交流基础上开展交换活动,满足生产生活消费需要,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互联网为贫困地区开拓了市场,使得贫困群众可以寻找机会融入更大范围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为自身谋求发展空间。可以说,网络经济为贫困群众带来的财富价值呈现双向互动作用,既表现在经济成本的递减效应上,也表现在经济效益的递增效应上。成本的递减效应是指由于互联网的扩散性,贫困群众通过网络开展经济活动的成本逐渐减少;效益的递增效应是指由于互联网的累积性,贫困群众通过网络开展经济活动的收益不断增加。

在网络经济活动中,长尾效应深刻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动,无论贫困地区的产品或服务类型如何,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相应的消费对象,而且互联网的外部经济性也会带来经济良性循环,不断扩大贫困地区经济影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整体向小康社会迈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贫困地区群众通过拍摄家乡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短视频,吸引游客,推动乡村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①。“直播经济”给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带来生机,克服了传统网络营销的图片文字模式,通过动态视频直观展现贫困地区一体化的生产环境、生产模式和生产优势,从而带来可观的销售业绩。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带来的扶贫价值可以从多层面精准扶贫,“通过互联网积累、搜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可以通过较少的人力成本真正实现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动态跟踪和脱贫检测,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②。从扶贫主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多方面收集贫困信息,进行扶贫对象的筛查识别,确保扶贫精准到位,既保证应扶尽扶,也防止过度帮扶,将扶贫资源用好用对,在扶贫中优化政府职能,锻炼党员干部,密切干群关系;从扶贫方式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对接,减少中间环节,加快扶贫速度和监测预警,能够及时了解贫困人口的信息变化,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防止作风飘浮带来信任流失;从扶贫对象来说,贫困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有效反映真实状况,获取透明信息,加强上下沟通,防止扶贫偏差和扶贫欺诈,杜绝虚假脱贫,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水平。

2. 活跃精神思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体现在物质富裕上,而且表现在精神素养方面。“网络扶贫能够推动扶贫思维的深层变革”^③。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扶贫的关键是精神脱贫。精神脱贫在于贫困群众要有脱贫的志向和决心,同时还应把提升自身的精神素养作为脱贫的重要标志。只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实现了脱贫目标,才能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要求。

从互联网精神扶贫的效力来看,主要有:第一,互联网开阔贫困群众的视野。互联网打开了贫困地区连接世界的窗口,贫困群众通过互联网可以突破地域界限,随时了解各地的资讯信息及人情风貌,改变由于经济条件受限的认知领域,找到广泛的兴趣和交流的对象,在网络空间中开启新的生活体验。虚拟空间中的精神体验超越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不断强化主体的精神沉浸性,帮助贫困群众从不同视角来体察自身和世界变化,获得深刻的精神开发价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力量。第二,互联网丰富贫困群众的情感。互联网带给贫困人口的不

①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cn/hlwfzj/hlwzbg/hlwjtjbg/202004/P020200428399188064169.pdf>。

② 黄钦:《互联网嵌入精准扶贫的模式与障碍》,《传媒》2019年第23期。

③ 李全喜:《网络扶贫的内涵及实践特色》,《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仅是各地的信息资源，更是全世界变化的动态特征，使其从火热的网络经济中感受到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贫困群众平静生活的心理状态被打破，情感作用机制发生变化，可以从网络空间中获得乐观、进取的情感体验，产生情感共鸣，不断强化精神能量，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意志。第三，互联网提升贫困群众的素养。互联网可以从多维度多层次提供贫困人口的精神发展需要，既可以直接利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优质师资力量和丰富人力资本，帮助群众接受教育培训，也可以促使群众利用互联网获取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实现不间断的自我学习，还可以在虚拟模拟技术中进行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克服时空障碍和环境束缚，实现与发达地区在不同方面的同步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贫困群众获取网络空间资源条件越来越便捷化，加速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第四，互联网改善贫困群众的思维。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禁锢贫困群众的思维水平，互联网是开放共享思维的具体体现，“我们看到，移动的数码媒体（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是如何帮助广大的中国农村移民在城镇打工的洪流中建立一个随身携带的‘家’”^①。互联网可以成为贫困群众观察社会的窗口，实现与开放地区的双向沟通，既体现在显性物质产品的互通有无上，也体现在视野思维的交流互动上，逐渐改善贫困群众的理想信念和思维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基础。

3. 丰富社会交往

“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②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互动是超越时空的交往，必然带来不同社会环境体验的互动交流。第一，扩大贫困群众的交往范围。贫困群众的现实人际交往范围狭窄，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自我的社会交往心理都处于弱势状态，难以打开交往局面，限制了自身发展。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屏蔽了经济收入差距和地域环境局限，技术中介下的间接性交往促使交往双方更多地处于平等心理状态，贫困群众的自信心与自尊感得到保护，使其敢于克服心理障碍，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进行多种多样的网络社交活动，不断扩大社会交往范围，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氛围。第二，改变贫困群众的交往层次。在现实社会中，利益交往决定着贫困群众难以突破自身生活阶层，被束缚于现实经济关系之中。但是，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发生转变，即经济交往关系以网络社会关系为基础，“人的社会属性、社会行为不再是经由血缘、经济这样一种传统的纽带来连接，而是纯粹的连接”^③。也就是说，贫困群众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与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交流互动，从而获得信息、资源和思想观念上的支持和帮助，逐步改变生活境遇，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第三，增强贫困群众的交往能力。贫困群众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加入不同的公共场域，改善现实社会交往困境，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从而在网络空间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力。网络空间社会权力表现在通过互联网社交工具自由表达意见，影响社会舆论，获得社会支持，推动价值变迁。在网络传播中，权力机制从纵向的行政权力主导转向横向的信息权力建构，信息权力作用机制分散，个体权力大大增强，贫困群众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发出声音，通过自身的话语表达来积聚力量，维护权益，发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监督作用。第四，改良贫困群众的交往效果。现实社会中贫困群众的交往价值效率不高。从功利性价值来说，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贫困人口的交往环境，虚拟实践活动的无限性可以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或场景，克服现实交往的限制，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开启寻找财富的新通道。

① [英] 丹尼尔·米勒、[澳] 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③ 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79页。

从情感性价值来说,“研究表明,虚拟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具有治疗效果的”^①,网络社会互动交流空间广阔,对象多元多样,贫困群众既可以从中寻找情感激励或情感慰藉,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新鲜的情感体验,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情感释放或压力疏解,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秩序稳定。

4.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②。互联网技术对于贫困群众来说,提供了大量无法从自己实际生活中获得的信息资源,满足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信息资源的开放流动是对贫困群众的发展支持,贫困群众在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和效率,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和资源交换。“人类世界正在实现‘万物感知’向‘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过渡。”^③贫困群众可以逐步在资源优化配置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智能技术生产力带来的是物质财富的普遍化和资源匹配的精准化,既能从整体上为贫困群众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撑,也能为贫困个体提供点对点服务,通过智能服务将个体需求纳入整体系统之中,摆脱原子化生存状态和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重塑产业价值链,形成扶贫的整体合力和综合效应。大数据将引起社会的产业升级和变迁,形成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贫困地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带来对人的能力要求的提高。互联网技术促进贫困地区人的能力和人的个性的发展,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内涵。即人不仅可以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品质等方面的充分发展,还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进一步挖掘潜能,发挥天赋、个性和特长,将自身从束缚的环境条件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虚拟发展,突出显示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

互联网技术为实现开发式扶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拓展了贫困群众的社会交往能力、工作活动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等,同时也促进了贫困人口释放自身潜力,增加个性表达机会,帮助他们感受自我超越的成就感。互联网技术促进贫困地区人的价值实现,在于提供了新型发展路径。互联网领域多元化企业组织的业务拓展,带来了贫困人口价值实现的广阔平台。虚拟空间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形成国家、企业、社会组织 and 个人的互动交往机制,蕴藏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贫困群众在网络空间中实现物质资源和精神文化的多向交流,可以从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而且,世界贫困人口能够通过互联网技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扶贫事业的进展,贫困个体获得的援助将在网络空间中成为鲜活的扶贫案例,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产生正面作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在国际层面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际传播效应。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互联网扶贫的影响因素

“没有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④互联网技术为扶贫事业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网络空间的技术发展、资本投入和文化传播等深刻影响扶贫事业的发展走向,深入探究不同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强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多维动力。

① [英] 丹尼尔·米勒、[澳] 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② 参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③ 《迈向万物智联新世界:5G时代·大数据·智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2页。

1. 技术发展

“互联网鸿沟成为制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值得关注的因素，网络扶贫相应成为一个崭新的领域。”^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只有掌握技术创新密码，才能运用前沿技术从事扶贫事业。互联网技术扶贫的改进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网络技术基础。“以信息推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逐步受到认可。”^② 中国农村网民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偏低。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涉及的贫困地区存在差异，各地的互联网技术基础也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贫困地区为了获得信息、人才和资源，往往面临着技术设施缺失的困境。对于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网络技术基础的改善能够带来扶贫事业的加速发展，促进扶贫网络的扩张、产品的销售以及贫困人口的网络发声，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而且在贫困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新技术的运用存在知识和技能上的阻碍，表现为技术能力贫乏现象，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互联网扶贫领域加以解决。第二，网络技术壁垒。网络技术壁垒是指利用一定的技术标准，对技术产品进行控制的行为。不同性质的企业为了保持垄断地位，采取各种方法对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进行束缚，限制对手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互联网扶贫领域的技术壁垒体现在差异化对待贫困地区的互联网技术配备要求和创新改造，采用双重标准以降低投入成本，扩大获利空间。减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网络扶贫领域的技术壁垒，可以降低技术门槛，帮助贫困群众利用前沿互联网技术，使贫困地区及时获得最新的技术支持，进而大大提高互联网扶贫的效率。政府指定企业进行扶贫技术开发，也需要规避技术垄断问题，避免出现企业利用技术标准绑架政府决策行为，只有将政府的扶贫目标与企业的扶贫动力相互结合，才能逐步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技术标准。第三，网络技术联盟。网络技术联盟是指在网络空间中技术先进厂商利用行业优势，彼此之间达成协议，共同采取市场竞争策略，保证共同利益的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障方面。”^③ 在网络技术联盟中，技术优势企业更多地从利益角度考量得失，难以全面考虑贫困群众的长远需求，不能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长期民生问题。如果网络技术联盟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进行技术勒索，哄抬技术设备价格，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就会侵犯贫困人口的平等权益。政府扶贫主体既要利用政策杠杆在一定时期内对技术价格进行协调，更要注重形成贫困群众技术权益保障机制，保障互联网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第四，网络技术代码。网络技术应用都是技术代码实现功能。谁掌握代码控制权，谁就可能掌控网络空间信息流动、数据安全和资源分配。贫困群众在技术代码争夺中难以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技术条件的改善需要长期的教育投入和资金支持，不同层次的贫困地区存在现实因素的限制，需要得到国家层面或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④ 贫困地区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虽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但是涉及互联网的系统性问题，既要避免过度介入而陷入“帮扶陷阱”，也要避免只顾眼前利益帮扶，忽视基础技术支撑，从技术上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长效扶贫机制。

2. 资本投入

互联网技术创新需要资本投入，资本投入不断推动网络技术进步。“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

① 《脱贫攻坚干部培训十讲》，北京：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82页。

② 张学波等：《嵌入与行动者网络：精准扶贫语境下扶贫信息传播再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20页。

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① 资本与技术之间形成一定的促进关系，也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互联网扶贫带来了动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资本与网络信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流动看似无序，实则蕴藏着资本逻辑。从表面上看，网络空间人人平等地享有信息权力，但是这种信息权力有层级差距，资本可以利用自身权力掌控信息走向。当资本需要信息时，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垄断信息，充分挖掘信息价值。贫困人口在网络空间中大多被动地接受资本提供的信息资源，甚至被资本过滤的信息所引导。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时代，资本通过大数据随时收集信息，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处理，更加保障资本的信息权力。所以，涉及保护贫困人口的信息权力或数据隐私的问题，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加以重视。第二，资本与网络资源。网络空间中的资源流动遵循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一方面是技术可以改变资源流动规律，技术创新提升资源流动效率，另一方面是市场交换带动资源流动方向，市场规律可以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改善网络空间资源配置格局。无论是在技术逻辑，还是市场逻辑中，资本都起到主导作用。对于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行为，资本就会加大投入，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公正价值出发，需要考虑如何驱动资本帮助贫困人口利用互联网积累资源，从而在无形之中减小贫富差距。第三，资本与网络舆论。在网络空间中，个体获得技术赋权，可以在网络舆论场域中发出声音，改变舆论生态。资本为了获得舆论支持，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舆论干预或诱导，导致舆论风向改变。资本介入网络舆论的方式多种多样，通过利益驱使、情感调动、议题设置、技术调整等都可以达到舆论效果^②。资本改变网络舆论的目的是获取利益，从经济效益出发影响舆论倾向，贫困人口从资本逻辑上难以获得垂青。掌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网络话语权，避免贫困群众成为网络舆论的弱势群体，需要将资本力量和扶贫需求相互结合起来，协调网络舆论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第四，资本与权力分化。网络空间中的权力逻辑与现实社会有着重要区别，知识权力的力量大大增强，行政权力受监督范围越来越大，法治权力价值亟待提升。资本权力贯穿在网络空间不同领域之中，起到无形的权力调控作用。对于贫困人口而言，难以有效认清资本权力影响，对于网络空间中利益机制的运行机理难以有效鉴别，尤其是网络公共领域和网络社交媒体，在人情化社会中对贫困群众的影响深远。网络空间资本逻辑的存在，需要主流网络媒体加大正面导引，体现法治理念，界定不同网络空间主体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防止资本权力越界，创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3. 文化传播

网络文化的技术逻辑和传播规律给贫困群众带来不同的信息环境，改变贫困群众的思维反应。第一，文化繁杂性。互联网技术凸显文化的交叉渗透和颠覆效应，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也超越文化主体的生存境遇，开启了新型文化生产传播机制，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场域和文化体验。互联网文化繁杂性带来的是对文化鉴别力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化主体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思维，才能在繁杂的网络文化中分辨是非善恶，洞悉文化真谛。贫困群众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文化环境的全方位影响，由于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缘故，在区分网络信息真伪是非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存在辨别文化价值、发挥文化优势、坚定文化自信的障碍，如果在主流文化的正确引导下，必然会扩大文化视野，开阔文化思路，启发文化思维，带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活力。第二，文化瞬时性。网络文化本质上是技术文化，只要技术改变，文化形态就会发生变迁，体现在网络文化的即时性和更替性突出。对于贫困群众而言，既需要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浸润和熏

^① 《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② 参见陈联俊：《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挑战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陶,也需要当代技术文化的视野和速度。在网络空间技术文化中,贫困群众易被技术的多变迭代性文化逻辑所吸引,从而更多地发掘自身的文化兴趣。网络文化的瞬时性影响还表现在文化形态上,贫困群众在网络空间中不仅获得多种类型的文化观感,而且从不断流动的文化形态中获取文化信息,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会刺激贫困群众的文化能动性,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基础。第三,文化矛盾性。网络空间文化来自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时代境遇,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如果不同文化理念相互对立,甚至敌对仇视,必然带来文化交锋。文化交锋通过文化主体表达出来,表现在对不同文化的蔑视、攻击、抹黑等,从思想观念到网络言行,都会体现出文化冲突的威胁。网络空间文化冲突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和重建,贫困群众虽然在文化水平上相对处于弱势,但是从文化交锋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可以直观感受到捍卫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价值,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文化抗争,并通过自主学习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短板。第四,文化包容性。网络文化的包容性大大增强,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小众文化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生成,找到自己的支持群体,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环境。大数据时代的文化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精准识别用户需求,洞察社会心理,调动大众情感,网络商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为倡导主流价值认同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网络文化包容性带来了多变的文化循环,不同的贫困人口选择多元的网络文化,催生不同的文化取向,造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多样性。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互联网扶贫的治理路径

“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做不好,不但贫困群众不满意,人们也会怀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真实性。”^①互联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成果,运用互联网技术,注重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重路径对贫困现象进行综合治理,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系统合力。

1. 技术治理

“未来20年,农村贫困地区则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发展和脱贫致富的最大盈利点和最广阔的市场。”^②技术配备是网络扶贫的基础,技术创新是网络扶贫的关键。第一,普及网络技术应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指出:“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年龄因素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③中国政府制订《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先导力量和驱动作用,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互联网扶贫工作。各地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巩固互联网技术设施的扶贫工程地位,突出互联网技术具备的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创造民族未来的重要价值,将其纳入各级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规划,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数字农业创新中心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对扶贫事业的带动作用,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利用补齐“数字基建”和技术服务的短板,刺激经济增长,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同时,加大普及贫困群众的互联网技术教育,方便他们与家人或亲属沟通联系,提供免费的上网培训指导和无障碍使用的上网设备,减少上网费用,将互联网技术作为增加收入、获取专业信息、互通有无的重要途径,提升贫困群众对互联网的认识理解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互联网企业将网络扶贫作为社会责任要求,不仅将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目标,而且在推动互联网扶贫中展现技术实力,扩大市场影响,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塑造良好的企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② 《脱贫攻坚干部培训十讲》,北京: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

③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cn/hlwzfzj/hlwzbg/hlwztjbg/202004/P020200428399188064169.pdf>,2020-4-28。

业形象，形成多赢局面。第二，协调网络技术机制。在互联网扶贫中，政府投资可以提升核心技术的掌控能力，尤其涉及资金、人员和资源的调配机制和优化整合，防止资本力量在扶贫领域的支配引导，通过技术要素的市场化竞争机制破除技术垄断，培育新型主体，开展技术创新，稳定技术价格，在持续解决扶贫问题中提升技术服务水平。利用市场力量培育壮大扶贫新兴产业，改造提升扶贫传统产业，形成扶贫新动能，发挥产业扶贫的积极效应，激励企业开发扶贫市场，运用产业创新的技术能力实现扶贫目标。第三，满足网络技术权益。“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①从贫困人口的状态来说，绝对贫困将在中国消失，但是相对贫困却会长期存在，如何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不断改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技术扶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能否及时满足贫困群众的权益需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绘制贫困人口图谱、群体画像以及需求分布等生态特征，保证互联网扶贫的精准分类到位。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扶贫中，突出一定的前瞻意识和创新意识，既从实际出发，又长远谋划，延伸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长期扶贫效应。第四，强化网络技术保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②互联网扶贫形成完善的“造血式”扶贫机制，强调网络技术扶贫的保障性。从政府层面上落实互联网扶贫的资金来源、人员分工、规划措施等，加速推动互联网在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生态扶贫以及各类专项扶贫工作的应用，建立起网络扶贫信息服务和分级分类治理系统，落实互联网扶贫的责任要求。而且，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基层智慧治理体系”^③，加强贫困群众数据安全保护，建立多维贫困的动态监测和防止返贫的帮扶机制，保证贫困群众的信息观念、资源流动与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削弱突发因素带来的返贫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工作奠定技术基础。互联网扶贫技术机制在统筹国内外扶贫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凸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

2. 制度治理

“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④资本在推动互联网技术发展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既利用资本的不懈动力，又防止资本主宰网络扶贫领域，运用制度力量进行规制约束。第一，明确多赢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网络扶贫领域，明确扶贫事业的人民性要求，避免扶贫工作沦为资本工具，带来公信力的流失，影响政府执政和社会稳定，但是也将资本收益纳入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专业优势，形成推进网络扶贫的强大合力”^⑤。互联网扶贫要树立多方共赢理念，实现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保证资本的一定效益，调动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多方共赢是秉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实际情况出发形成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理念。在建构多方共赢的制度体系中，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得以巩固，政府、企业、社会、个体分别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第二，改善政府效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③ 《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人民日报》2020年4月15日。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⑤ 李云新、王振兴：《网络扶贫的动因、方式与绩效——基于“网络扶贫创新优秀案例”的考察》，《电子政务》2019年第9期。

能。”^①政府的网络扶贫主导地位是保证扶贫事业顺利推进的根本，需要不断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政府扶贫的效能水平。“中国社会扶贫网”隶属国务院扶贫办，据网站实时更新数据，截至2020年4月，建档立卡贫困户注册已覆盖28个省、359个市、2592个县、378948个村，发布贫困需求660.05万个，对接成功521.2万个，募集资金85984.16万元，发挥重要的精准扶贫作用^②。政府网络扶贫效能的改进依赖于对网络扶贫事业的认知理解、全面谋划、实践积累等综合效应，尤其是逐步建立互联网扶贫的制度体系，构建全方位制度系统约束资本行为。在制度体系中，将法治体系作为互联网扶贫的基础保障，通过法律明晰多方主体权责，形成良性的社会预期，防止资本驱动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第三，发挥企业价值。互联网扶贫需要市场力量，企业是市场主体，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动员各行业企业参与扶贫，探索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平台扶贫、教育扶贫、消费扶贫、公益扶贫等相互结合的一体化互联网扶贫模式。顶层设计将企业利润和扶贫目标结合起来，也就是企业通过扶贫领域开拓新兴市场，开展技术创新，提供产品服务，而贫困群众则可以通过互联网企业获得经济实惠，形成长期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制度约束互联网企业可能在扶贫事业中出现的市场欺诈、侵犯数据隐私和信息权力行为。另外，针对互联网企业的非本地化属性构建第三方监督机制，即互联网企业介入扶贫领域，需要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流程监控、投诉反馈等，逐步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网络扶贫风险防范机制。第四，激发个体动力。只有所有个体都脱离了贫困，才是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上，否则就会贻误全局。”^③互联网扶贫的关键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发力结合起来，开展针对性帮扶，精准施策，突出效果，激发贫困群众的长效内生动力。既从供给侧为贫困群众创造接受互联网教育培训的平台和条件，不断提升网络素养，也从需求侧发掘贫困个体的不同需要，推动适应网络经济活动和网络交往模式，主动利用互联网资源，行使民主权利，参与互联网领域的贫困治理，减少相对贫困带来的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实现个体价值，追求幸福生活。

3. 文化治理

文化水平提高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互联网扶贫领域，文化扶贫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突出网络文化引领。网络文化纷繁复杂，虽然为主体提供多元的文化形态、丰富的文化种类和新颖的文化观念，但却带来文化选择的困境，尤其是对于贫困群众而言，没有成熟稳定的文化价值引导，极易被网络空间错误思潮或观念所诱导。在互联网扶贫中，把握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采取合适的网络载体和手段进行价值教育，将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相互结合起来。“借助互联网推动文化扶贫，创新扶贫模式，将有效地推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④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文化教育和文化熏陶，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改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激发贫困群众的智慧力量，形成贫困群众的内源追求，补齐精神短板。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扶贫领域的应用，培养网络空间中扶贫信用意识，打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扶贫领域的信用基础。第二，发掘网络文化需求。发掘蕴藏在贫困人口之中的文化需求，通过互联网技术不断满足不同民族、地域、背景人口的文化需要，维护文化主体性，激发民族文化活力，形成民族文化现象，逐步提升贫困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贫困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水平既有相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扶贫网，<https://www.zgshfp.com.cn/?p=1>。

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④ 王胜利、谢露：《“互联网+”助力文化扶贫》，《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中）。

关性，也有超越性，可以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完善贫困人口文化体系，创造新型网络文化扶贫机制。不同文化主体承担不同的文化责任，不断克服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文化差距，利用互联网技术消除文化鸿沟，推动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保障贫困群众文化权益，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共享。第三，规制网络文化冲突。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创造了文化活力，也带来了文化冲突，既表现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分歧，也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内部文化冲突，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容许不同文化长期并存，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发展，扩大贫困群众的文化视野。对于不同国家文化而言，文化差异可以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在意识形态领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蚀，制止“网络文化霸权主义”扩张，维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土文化影响力。第四，优化网络文化生态。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多重文化矛盾^①。网络空间的文化矛盾尖锐，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内容治理，提倡向上向善的文化观念，净化网络文化生态。发挥主流媒体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力量在网络空间中了解民情民意，及时释疑解惑，化解矛盾纠纷，辨析舆论思潮，提供听得懂、听得进的主流价值话语，占据网络空间价值高地。同时，逐步利用互联网领域的算法推荐、数字技术、5G技术、人工智能等让文化资源活起来，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活力，使互联网成为贫困群众的精神家园，通过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价值引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②互联网技术在扶贫领域大有可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展现巨大的扶贫价值，增进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进一步扩大应用。互联网扶贫领域的主体动力、作用机制、市场动能、协同创新等尚需深入研究，进而推进扶贫事业发展，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3]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 [4] 马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5] 谢舜、覃志敏：《“互联网+”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以广西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 [6] 刘学琴：《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与路径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
- [7] 夏一璞：《试论精准扶贫的创新价值与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编辑：黄华德）

^① 参见邓纯东：《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反思》，《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